

02

聚商·锋线 FENGXIAN



“医药企业目前去国外组织年会的情况不多了,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人员扩张速度很快,规模太大不好组织;而另一方面,现在全球跨国公司的业绩都受到挑战。”

年会“凶猛”

□ 赵奕

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现在成了医药企业包场搞年会的地方。在阿斯利康4000人的年会刚刚结束后,罗氏1600人的队伍就进驻了,而排在罗氏后面的是另一家跨国公司葛兰素史克。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我们离开的时候,葛兰素史克已经摆出了签到台,正在签到呢,一茬接一茬。”一位罗氏的员工表示。

对于拥有3000个房间的威尼斯人酒店来说,庞大的房间数量让其成为医药公司的首选,实际上,在元旦前,另一家跨国药企雅培也在这里举行了年会。

“今年真的是很巧,四家公司都集中在澳门办年会,我明显地感觉是,如果公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么宾馆要不断扩建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位跨国药企的高管表示。

事实上,得益于近年来国内市场医药代表数量的飞速增长,跨国公司的年会参加人数也随着几何级数在上升。随着人数的不断庞大,找到相应的宾馆来容纳这么多人成为各个公司头疼的话题。

去年,辉瑞5000多人的年会在东莞举行,包用了当地七座五星级酒店,被行业内称为“第一年会”。而今年,辉瑞转战北京九华山庄——这一北京地区最大的宾馆。“除了九华山庄,我们还包用了另外一个宾馆,单个九华山庄是装不下我们这么多人的。”一位辉瑞的销售代表表示。根据随后同样在此地搞年会的拜耳方面表示,九华山庄刚好装下3600人。

在辉瑞为期3~4天的会议后,销售代表们将分作七八组,按照不同的目的地进行旅游。“我们不可能像其他公司一样,聚在一起出去旅游,我们体量太大了,今年不是还把惠氏并进来了吗?”

“医药企业目前去国外组织年会的情况不多了,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人员扩张速度很快,规模太大不好组织;而另一方面,现在全球跨国公司的业绩都受到挑战。”一位跨国药企的员工表示,回顾历史,该企业曾经在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尔代夫、马来西亚等多处地点召开年会,而今年则选择在国内。

同时,一位跨国药企的员工表示,老板的风格也是决定跨国药企能否“走出去”开年会的关键。由于新上任的老板往往希望保持低调,同时注重业绩表现,因此在年会选择地点上趋向于国内,而随着在任时间的加长,则逐步开展“跨国年会”。

论商 | Lun Shang

徽商为何“贾而好儒”

□ 吴铭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

□ 吴晓波

编者按: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历了多次大考验,企业也在一次次历练中遭遇了“多重门”。十年沉浮中,有的企业度过了起伏的波折开创了新的局面,有的一直踏踏实实稳步走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的则处境危险。近期,浙江省中科院副研究员吴晓波在刚刚结束的中科院新年论坛暨十周年庆典上,从独特的视角为大家解读新世纪下浙商面对的新挑战。

浙商迎来了第四个成长周期

在1995年之前,中国的企业史上是没有浙商这个名字的,在民国时候有所谓十大商帮,浙江有两个帮,一个叫龙游帮,一个是宁波的凤帮,有晋商、徽商、海商,当年福建的商人叫海商,有粤商,但是没有浙商的概念,浙商这个概念在1995年以后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到今天为止已经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的商帮。钱很多,市场观念很强,这是全中国其他省份对浙商的印象。

三十多年来浙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四千精神”的一个时期,大家都很穷,从温州地区、宁波、绍兴这些地方光着脚丫子开始闯荡全中国,“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言万语”,这四个千加在一起就是做生意。所以我们浙江是一个靠贸易起家的省份,四千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靠这么辛苦地干,到1989年发生了一个大的风波,1990年中国经济陷入很大的低迷期,1991年以后浙江



吴晓波

经济突然在全国变得非常有名,1992年中国开始宣布要搞市场经济体制,浙江在那个时候点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大省,当时义乌的小商品城,路桥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每年大家都在比,我们今年的交易额多少,这三个是全中国很长时间内排在全国专业市场前三位的。国家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浙江省专业市场在全国非常有名。浙江商人真正地崛起是靠专业市场崛起的,所以整个90年代浙江省专业市场在全国赢得了很大的尊敬和财富。

到了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以后,内需市场出现了一个大的低迷,然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从泰国到韩国,整个被索罗斯打垮了,浙江省整个制造业,全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外泄,中国制造就开始出来了,浙江省外贸依赖度从17%左右增加到现在超过80%,这个是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所以1998年、1999年以后浙江省制造业开始向外贸转型,走了将近十年。

这是我们过去走过来非常清晰的三个阶段,来看这三个阶段,各位

会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产业的方向,整个财富的流动的方向是以贸易为龙头的,无论是四千精神也好,专业市场也好,做外贸也好,浙江总的来讲是做贸易出身的,我们的商人特征非常明显。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成长的周期,也迎来了新的变化。

浙商开始遭遇“三变”

浙商在贸易起家以后就开始搞制造业。最早大家知道温州的五马街前店后厂,下面开始卖裙子卖衣服,上面缝纫机开始做生产,这种特征很明显,先是做贸易,贸易赚了点钱,开始买机器买设备,做制造业。制造业发展以后,就开始开发一些技术,所以贸工技的这个特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给我们浙江商人烙下很大的烙印。那么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些老板们企业家面临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归结起来一共有三变。

第一个是天变了。从2008年的3季度,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其实到现在为止,整个欧美市场还没有走出这个大的循环圈。我觉得在未来的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欧美市场的复苏是绝无可能的。而欧美市场的崩塌,意味着支撑了过去十年,浙江经济发展外向型的逻辑终结掉了。第二个是地变了,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其他省份比起来是最落后的,而且我们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模式本身就是贸工技,技术永远放在最后一位。我们过去十多年没有花很大的决心去开发我们的核心技术,而我们要在短时



间内转型,我觉得很难。第三个是人变了,第一代的企业家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晚年了,而第二代企业家里面却还没有出现一批领军性的人物,浙江省整个企业的接班人面临断层的危险。

困境下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么多的挑战和压力下,浙商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注意现金的流通安全。第一个我觉得是要尽快地实现市场内向化转移,我们过去十年赚了外贸的钱,很辛苦。现在呢?中国制造业核心应该转向内需。

浙江省的企业家都是做传统产业出身的,从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起步的,然后做袜子、电器,这些都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在浙江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即刻转向高科技的新产

业,我们要做的是思考一下怎么使传统产业跟这些年发展的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经济做一个好的嫁接,这是我们浙商很大的一个出路。

未来浙江省大量的制造型企业、传统型企业会走到什么模式呢?电子商务+专业公司+小制造,这是我们第二种可能性。其次是要培养真正的隐形冠军。浙江的这些民营企业家要出一个世界五百强很难,对浙江经济而言,扶持和培养一千个隐形冠军比培养一个世界五百强更重要、更现实。

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同时面临很大的空间,毕竟未来十年全世界最好的经济体仍然是中国,全世界最容易赚钱的地方仍然是中国。我们浙商的未来是建立在我们人的优势、产业的优势、金融的优势等传统优势上的制度创新。



山东以其经济总量大、投资环境好、市场潜力大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家来鲁投资兴业,他们以商人群体独有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各地凸现的商机。

投资山东十大风云人物开评

□ 张岩

记者在1月24日举办的“荣耀2010投资山东十大风云人物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投资山东十大风云人物于即日起开评,2月下旬结束。

据悉,该活动评选范围是山东省外在鲁投资创业、对山东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异地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家们。通过推荐报名、入围展示、网上投票、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揭晓。

近年来,山东以其经济总量大、投资环境好、市场潜力大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家来鲁投资兴业,他们以商人群体独有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各地凸现的商机,特别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成为国家战略后,更是给长期以来专注山东经济的国内外商家带来投资机遇,一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在他们的推进下,呈现高端高效高质加速迈进的良好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各地与浙商共签订投资项目1200多个,投资总额达3500多亿元,山东省浙江商会名副其实地成了承担起连接鲁浙两省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山东省浙江商会副会长、秘书长叶蔚秋告诉记者。据了解,在山东已经落地成型的项目中,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汽车、造船、海洋渔业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仅在青岛就有85家。



徽商大宅院

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徽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者,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

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

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微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体,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

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